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

李福泉 主编

古代帝王权术大观

韩隆福 著

岳麓书社

韩隆福 著

古代帝王权术大观

主 编 李福泉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胡 颖

·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 ·

古代帝王权术大观

韩隆福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0,000 印张：6.5 印数：1—3,000

ISBN 7—80520—723—2

K·138 定价：7.5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序

帝王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构架的支柱，帝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衰衍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古代帝王文化丛书》以帝王文化为视角，全面系统地勾勒出历代帝王文化生活的内涵、历史演变及社会价值，揭示中国古代帝王社会的文化品格，以丰富我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内容，推动文化史研究向着更高的社会层次深入。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平民文化与统治文化两个层面，呈现出基础与提高的两个发展序次。平民文化本身也在不断提高，但社会权力却赋予统治者以垄断文化的特权，因而统治文化具有更多的发展与提高的条件，如同儒家学说在古代中国思

想中占有统治地位一样，统治文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主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生活习俗、文化娱乐，乃至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不在统治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变化。高踞于统治权力顶峰的帝王在握有天下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强有力地介入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享受着社会提供的最赏心悦目的文化乳汁。正因为帝王文化处于统治文化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帝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双面影响。其正面影响，一在于帝王文化内涵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宫廷建筑、音乐歌舞、杂耍艺术、帝王文学、统治思想和谋略中精品屡见，具有永恒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二在于帝王文化以其特有的地位深刻地影响乃至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优秀的帝王诗词丰富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帝王巡游中发生过影响重大的军政大事，更有权术谋略支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等等，帝王文化因此而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帝王文化以其正面影响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其精彩纷呈。帝王文化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其垄断性和腐朽性。专制独裁的文化氛围始终制约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专制帝王对文化人实行文化专制，箝制思想，制造文祸，规设禁书，将大量文化娱乐禁闭于宫廷，从而达到垄断文化的目的。帝王们还利用握有的权势，随心所欲，在文化享受上寻求刺激，淫声、

秽色和绯闻弥漫于帝王文化的殿堂。帝王文化的垄断性和腐朽性，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是其中的糟粕。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帝王文化伴着帝王制度的失落而成为历史遗存，新世纪的曙光降临在中华大地。随着物质文化的日益丰富，人们越发感觉到精神文化的珍贵。了解和研究帝王文化，有助于人们清理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对帝王文化的批判过程中，吸取其进步性的精华，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通过历代方方面面帝王文化生活的观察，正确认识我国封建社会的本质，更加珍惜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本丛书以正史和实录为依据，广撷历代野史、文集、笔记、诗赋、逸闻和考古资料，内容涉及帝王历史、权位角逐、谋略权术、文祸要论、家族悲欢、后宫世界、生活起居、宫廷娱乐、咏世诗文、巡游记实、陵寝规制等等。这里有诸多帝王文化制度的源流演变，有历朝历代皇室的风云变故，有鲜为人知的帝王宫闱趣闻，有堪称珍贵的帝王诗文词赋，还有多彩多姿的帝王生活知识的描绘。读者将从这一套融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化丛书里获得神秘的帝王知识，窥视宫廷文化的基本面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奥妙，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由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帝王众多，朝代更替，疑窦丛生；文化概念模糊，内涵广阔；帝王文化资料浩瀚芜杂；

著者学识浅陋，时间匆促等等，本丛书在编目的安排、制度的考释、史料的选择和理解等方面必有疏漏和错误，如蒙专家和读者指正，则幸甚。

李福泉

一九九六年冬于岳麓山畔

前 言

《周礼》言帝王有“八柄”：“一以爵驭其贵；二以禄驭其富；三以予驭其幸；四以置驭其行；五以生驭其福；六以夺驭其贫；七以废驭其罪；八以罪驭其过。”说明帝王用爵、禄、予、置、生、夺、废、罪等来决定人的贵、富、幸、行、福、贫、罪、过，作为八条驾驭臣民的手段。说穿了，帝王的“八柄”之术，操纵着天下人的生死、贫富和荣辱。在创业时，可以此作为韬晦、联姻、赏罚、剿抚、牵制、反间之术；在驭臣上，可以此作为笼络、防范、刑罚、树威、平衡、用人、倡忠之术；在制民上，也可以此作为自神、罪己、移视、愚民、宣传、怀柔之术。

帝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作为定国安邦“利器”的权术，在一些人心里往往与肮脏连在一起。其实，有权就有术，帝王为统治天下，驾驭臣民，考察官吏等等，自然会使用一些策略手段。帝王的权术，可以运用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成功与否关系着事业的成败。说到底，帝王之术也是智力较量和历史的产物。因而在古代一直被帝王运用着和发展着，有些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比如明君惩贪倡廉、守法，刘秀就说出了“天子与白衣同”的话，李世民亦认为“法者……乃天下之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少帝王为缓和矛盾，巩固统治，对自己的奢侈和过失，也能通过“罪己诏”，改弦更张，显然具有借鉴意义。

帝王的权谋之术，只要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能推动社会前进

的步伐，我们就应该给以足够的肯定。如君王的联姻之术，尽管“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但在客观上的价值却值得具体分析。象西施就冲破了“美人误国”的尘埃，虽是越王勾践作为“美人计”的工具，但同时肩负着复兴越国的重任，从而使她显出爱国的光彩。王昭君自愿请嫁匈奴，在民族联姻中使“和亲”政策走上正轨。隋唐时，在炀帝“混一戎夏”，唐太宗胡汉“爱之如一”思想指导下，伴随着开边屯田和郡县制及羁糜府州边地的设置，更使“和亲”政策发展到完善阶段。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带头与汉族上层通婚，其作用更不能低估。总之，帝王倡导各族上层联姻，既可带动下层民族联姻，加速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又可打破近亲繁殖，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发展史。

帝王的赏罚、用人之术，同样不能一概否定，确有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值得吸取。赏罚之术实际上是文武之道的运用，是任何朝代都在实行的法治手段。赏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适时、适中、适度、有信，强调军心、民心的标准和扬善惩罚、公允平衡的原则。齐威王整顿吏治、兴利除弊，将为民谋利的即墨大夫升为管理万户的太守，把盘剥百姓、吹牛拍马的阿大夫和贪赃枉法的官员一起处死，从而使官吏整肃，齐国大治。

然而，吏治清明还在于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这就必须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春秋时，晋国京师看守南门的卫尉解狐，按法把祁黄羊年迈的父亲打五十大板致死，可祁黄羊不为己私而弃贤才，毅然向晋悼公推荐了奉公守法、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解狐为南阳令，使南阳不到半年就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君王用人，要知人善任、用人不疑。魏文侯力排众议，任命乐羊为将，帅五万人攻伐中山国。乐羊起

初围而不攻，引起朝臣猜忌，但魏文侯深信不疑。乐羊在中山国君失去军心、民心后，发起总攻，一举克城，班师回国。魏文侯把大臣们弹劾诽谤中伤乐羊的两箱子奏章赏给乐羊，表示对乐羊深信不疑，并升封为灵寿君。往后的秦皇、汉武、光武、唐宗、武曌、宋祖、忽必烈、明太祖、明成祖、康熙帝等等，在其前期都称得上古代用人的明君。

帝王的怀柔之术也不能一概抹煞，象刘秀对赤眉起义的降卒，实行一个不杀，放回生产，减轻赋税的做法，就是一种缓和矛盾、保存劳力、恢复农业生产的怀柔政策，比白起坑杀降卒四十万、项羽坑杀降卒二十万的作法，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进步，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而庞杂的体系，精华与糟粕往往搅在一起。象越王勾践励精图治，复兴越国的计划应该肯定，大部分权谋之术也无可厚非，但把谷子煮大晒干献给吴国，使吴王夫差作为“良种”留下，导致次年颗粒无收，全吴饥荒。这种以牺牲吴国百姓为代价的谋术，应该受到谴责。帝王的权谋之术，尽管有智慧的火花，但必须具体分析，指明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是可以纳入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范畴，以便于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简单化解决不了复杂的历史现象，也是不科学的态度。

帝王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部分，帝王权术又是帝王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在有限的篇幅里不可能，也似乎没有必要穷尽帝王定国安邦“利器”的权谋之术的历史，但希望能从帝王在创业、驭臣、制民三者相连的统治体系中，能挖掘出一些给人启迪的东西来。

目 录

前言	(1)
创业之术	(1)
韬晦之术	(2)
联姻之术	(11)
赏罚之术	(27)
剿抚之术	(44)
牵制之术	(53)
反间之术	(67)
取臣之术	(74)
笼络之术	(75)
防范之术	(87)
刑罚之术	(95)
树威之术	(108)
平衡之术	(117)
用人之术	(126)
倡忠之术	(134)
制民之术	(144)
自神之术	(144)
罪己之术	(155)
移视之术	(162)
愚民之术	(171)
宣传之术	(177)
怀柔之术	(184)
严罚之术	(191)

创业之术

帝王的宝座，金光闪闪。

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古代中国，多少人想坐上这至高无上的帝王宝座！

血缘宗法的嫡长子继承制，并不能保证帝王宝座的取得和巩固，也无法避免血雨腥风权力的争夺。

历史说明，能开创和实现长治久安的帝王并不多，也不是每个帝王都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得到和坐稳帝王的宝座。

谁能开创和发展帝王的事业？归根结底恐怕还是实力和智谋的较量！

这就有了帝王创业之时的韬晦之术、联姻之术、赏罚之术、剿抚之术、牵制之术和反间之术等等谋略手段的运用。把这些通通说成阴谋，实际上并不合乎历史实际，也是不科学的错误态度。

帝王在创业之时，大多注重韬晦之术。楚庄王刚即位时，如果不深藏不露，又怎么能保存和发展自己？又怎么能发现忠臣、任用贤能和改革图强呢？又怎么能问鼎中原、饮马黄河和称霸中原呢？为了成就帝业，扩大势力和适应形势，帝王亦使用联姻之术，

特别是以“和亲”维系和平的联姻，象王昭君远嫁匈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等等，都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赏罚之术则是帝王使用的法治手段，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赏罚，只要适时、适度、公允、得当，就可以树立君威，巩固和发展帝王的事业。唐太宗等一些明君的赏罚，确有可取之处。与文武之道相配合的还有刚猛相济的剿抚之术，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光武帝等在这点上的运用是相当出色的。牵制和反间之术，亦为帝王创业时的重要手段。刘秀打出天下后，行“退功臣，进文吏”之策，实际上主要是启用江南人士来牵制武臣，适应了由武人执政向文臣执政转化的历史趋势。为了达到目的，不少帝王的反间之术也用得相当成功。赵国长平之战的失败和抗匈名将李牧的被杀，都是中了秦国反间计的结果。皇太极使用反间计，导致崇祯帝“自毁长城”，杀了冒死入关回救京师的爱国名将袁崇焕，实际上何只是袁督师一人的悲剧？同时也是崇祯帝自缢煤山和明王朝必然灭亡的悲剧。故对于帝王的韬晦、联姻、赏罚、剿抚、牵制、反间之术的使用，都必须具体分析。

历史有不可避免的重复，但更是流动取舍中的发展。

韬晦之术

帝王在创业之时，大都使用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的韬晦之术，以取得创业的成效。故韬晦之术在古代君王创业时占有重要的地位。象春秋战国的一些霸主雄王，封建社会的明君，在成就帝王之业时，所使用的韬晦之术，大都相当成功。

春秋时，晋楚长期争霸。公元前632年，双方发生城濮之战，晋文公以“退避三舍”还恩于楚成王的谋略，诱楚军深入中伏大

败，晋国威震天下，原来依附楚国的诸侯小国，又纷纷背楚附晋，晋文公率领齐、鲁、宋、郑、卫、莒等国诸侯，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欢迎周天子前来劳军，主持盟会，成为煊赫一时的霸主。

公元前 614 年，楚穆王子圉即位为楚庄王。楚庄王面对守旧势力的强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楚国争霸的愿望，一开始就能审时度势，深藏不露，善用韬晦之术。楚国要北上争霸，就必须先稳定内部，而守旧贵族若敖等王室势力强大，专横跋扈。楚庄王如果锋芒太露，必遭厄运。为此，他必须冷静观察，积蓄力量才能除奸兴国。因而，楚庄王在行动上想法把自己的才能和目的掩盖起来，给人留下一个荒淫无道昏君的形象。他即位三年间，不理朝政，纵情游乐，或去云梦行猎，或在宫中乐舞狂欢滥饮，“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史记·楚世家》），醉生梦死，给政敌造成假象，实际上是在保护和发展自己。但因时机不成熟，仍蓄而不发，公开下了“有敢谏者，死无赦”（《史记·楚世家》）的王令，继续给守旧的王室以昏淫的形象。泱泱楚国，北有强晋的威胁，东有群舒之忧，江汉腹地又有戎人、庸人、麇人并起反楚，不仅没有强大的征兆，朝中还发生公子燮、公子仪“二子”的叛乱，而且原来依附于楚的郑、陈、宋等小国又倒向了强大的晋国。楚国内外空前危机，爱国大臣伍举冒死进谏，只能以打哑迷的方式巧妙进言。说山上有只鸟，不飞不鸣为何鸟？庄王的回答是“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史记·楚世家》）。伍举听后也只能在磕头中表示愚见：不飞不鸣之鸟，就怕中猎人暗箭。大夫苏从听伍举说了情况后，也进宫直谏，但庄王仍和宫中美女戏乐。苏从忍不住批评庄王：国君三年不问朝政，长此以往只会象夏桀、商纣一样，招致身死国亡之祸。楚庄王怒抽宝剑要杀苏

从。苏从却毫无惧色，并讲出了一位爱国忠臣的肺腑之言：“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史记·楚世家》）于是，几年不理朝政的楚庄王，突然召集文武百官上朝，宣布伍举、苏从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忠臣掌管要职，前后任用者数百人，在人事安排上削弱了宗室若敖氏的势力。同时，庄王又杀了几个证据确凿、为非作歹的坏人，开始了改革图强的步伐。楚庄王亲政，罢淫乐、用贤才，诛杀数百奸佞小人，进行内政、军事改革，天下整肃，“一鸣惊人”。于是，楚灭庸拓疆，伐陆浑戎，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又破陈、平郑、围宋，为楚国的进一步强大打下了基础。

楚庄王的胜利，引起守旧贵族若敖氏司马子越椒的怨恨，因杀掌管百官和官营手工业的长官工尹茆贾，将军队驻于河南新野，举行武装叛乱，准备进攻庄王，夺取王位。楚庄王派人与子越椒和谈，遭到拒绝。庄王亲自带军前往平乱，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今湖北枝江县或襄阳西北），一举击溃叛军，平定了叛乱。若敖氏家族，只有出使齐国返回后认罪的克黄和逃奔晋国的贲皇得免。若敖氏叛乱的平定，解除了若敖氏对王权的威胁，抑制了上层贵族内乱的因素，提高了楚庄王的威信，加强了楚国争夺霸权的力量。

楚庄王平定若敖氏之乱，班师回郢都，大肆庆祝，招待满朝文武大臣在宫中宴饮。暮色降临，点起灯烛，开怀畅饮。据《左传》记载，庄王为使众臣尽兴，还把在韬晦中自己最宠幸的许姬传唤出来给众官敬酒。许姬向众臣殷勤劝酒，更使人如醉如痴。突然，一阵风吹来，灯烛全灭，宫廷顿时暗下来，只朦胧的月光照进宫内，照得已有几分醉意的臣僚们越发朦胧。众臣中竟有个臣子胆大包天，趁醉扯住许姬袖口，想捏住她的手腕进行调戏。许姬很生气，顺手揪扯下这位大臣的帽缨，急至庄王身边，低声告

诉庄王，要求掌灯查处这位调戏许姬失去帽缨的人。按楚国当时法令，调戏宫内美女是死罪，更何况是君王的宠姬！而楚庄王却满腹韬晦之术，能以政治家的气度，劝慰许姬：大臣醉后失礼可以宽容，不要因此小节扰乱了庆祝酒会。为此，庄王在重新点燃灯蜡时，要众臣都摘下帽缨，宣布来个不拘礼节的“绝缨宴会”。三年后，在楚晋争战中，大夫唐狡死命护卫庄王，五次杀退敌人的围攻，救庄王脱险。庄王问其故，唐狡才道出真情，实为报庄王“绝缨宴会”的不杀之恩。楚庄王深藏不露的韬晦之术，赢得了臣下的赤胆忠心。历史有必然和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越偶然越能反映必然。楚庄王庆功宴上唐狡之事本属偶然，但庄王如果不是明君而按许姬之意查出唐狡杀了，那么在战争中就不会有唐狡几次舍命救驾，楚庄王恐怕死了几次了，楚国的霸业也就可能成为泡影，至少还得推迟很多年。公元前597年，楚国在邲（今河南新郑县东）地大败晋军，威德并用，不作京观而祭河神、修神庙，胜利回师。在以后的几年中，楚庄王的霸业达到顶峰。故《左传》言楚庄王亲政后，文韬武略，“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

楚庄王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与任用贤臣孙叔敖为令尹进行改革和建设有关，也与他善于使用韬晦之术有着必然的联系。楚国君王的韬晦之术，实际上源于道家《庄子》书中“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是“无为无不为”观点的引伸。楚庄王即位初三年不理朝政，并非“无为”，而是通过这种“无为”达到“无不为”的目的，也就是顺应客观规律，用比较务实的以柔克刚制胜的手段。“君主南面之术”的韬晦之谋，也是楚国发展强大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策略，不能通通以阴谋权术加以否定，运用得当亦为安邦

定国的利器。

儒家也讲深藏、凝重，与道家不同的是着重威仪，主要是为保卫自身的安全和避祸而用。东汉光武帝刘秀，可谓是帝王中善用韬晦的政治家之一。王莽于公元8年废汉自立为帝，建立“新”莽王朝。但王莽代汉建立的“新”莽王朝的改制，并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反而激化了各种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特别是无法生存的人民，被逼起来反抗，爆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地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大分化，南阳大地主兼商人的西汉宗室刘缤、刘秀兄弟，抱着“复高祖之业”（《后汉书·齐武王縯传》）的目的，率领宗族、宾客八千人起兵舂陵，加入反莽的绿林义军。公元23年，绿林军已是各义军的中坚，选立懦弱无为的刘玄为帝，建立更始政权。王莽派王寻率四十二万将士及巨无霸训练的猛兽组成的“特种部队”前往讨伐。王凤、刘秀只有八九千人驻守昆阳，被王寻大军重重围困，危在旦夕。平时文静深藏不露的刘秀，在关键时刻却能勇敢地率十三骑乘夜突出重围，前往定陵、鄢等地调集救兵。实际上刘秀只收集了三千人马，可他先以传单攻心，瓦解敌军斗志，又利用敌人的骄傲情绪，出敌不意，忘死冲杀，攻击王寻指挥中心，恰遇狂风暴雨，泄水猛涨，莽军大乱惨败，自相践踏，王寻被杀，包括“特种部队”一起覆灭。王莽主力被灭，决定了新莽政权的崩溃。刘秀却在昆阳之战中大大提高了威信，其兄刘缤亦在宛城大战中立下战功。更始政权内部矛盾反而在胜利中激化，发生分裂。更始皇帝刘玄本是刘缤、刘秀远房兄弟，以功封刘缤为大司徒（丞相）。刘缤不知韬晦之术，仍想夺取帝位，扩充实力，竟居功自傲，不听调动，不会审时度势，锋芒太露。当时平林军久攻新野不下，城内守将又言只须刘缤一句